

外地人来兖州,若是打听说铁路俱乐部咋走,当地人会反问,是老俱乐部,还是新的?此时寻路者会一头雾水。说起来,兖州确实有两处铁路俱乐部,新的坐落在酒仙桥南路,而离火车站不远处,还有一座老态龙钟却浑身充满故事的老俱乐部,只是早已废弃不用。

上世纪50年代,为适应铁路蓬勃发展的需要,兖州恢复或新建起机务段、电务段等单位,一时间,数千名铁路职工家属从外地汇聚这里。针对业余文化生活设施缺乏的现状,济南铁路局拨款,于1957年5月在兖州铁路宣传站原址,神路街的北首,一座宽敞气派的苏式礼堂建筑——铁路俱乐部拔地而起。在紧靠礼堂南墙,一排日本人建造的平房里,设有办公室和图书阅览室。过往行人望着那人字形屋顶上飘扬的五星红旗,那可容纳600余人的放映兼会议厅,还有正门上方工整的“兖州俱乐部”五个大字,无不叹为观止。它是兖州的第一个职工俱乐部,落成后,县机关在这里召开过数次大型会议,可谓辉煌一时。

铁路俱乐部首任主任是于凤桐,落成初期没有什么娱乐项目,主要功能是晚间在大礼堂看电影,票价5分钱,买电影票有个只能伸进一只手的小窗口,看电影坐在一排排木制长条椅上,放映机为16毫米的小片子,尽管是小银幕,黑白片,视觉效果不好,可上座率还是蛮高的。那时候,一部影片在两三个地方同时穿插上演,这叫“轮片制”,俗称“跑片”,这活儿由放映员刘孝田、李智兼着。当观众正看得过瘾,突然电灯亮了,银幕上打出“请稍候”的字样,人们便知道是“等片”。几年后,刘孝田把济南铁路文化官淘汰的一部35毫米电影机带到了兖州,拆卸清洗后,重新组装,使之起死回生。这部片子投放的画面大,影像清晰,音响效果好,那可真是“鸟枪换炮”啊!

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初,俱乐部除了每星期放映四五场电影,还开展许多文艺演出活动。搞得最为活跃的,应该是谷寿生任主任时期,他把铁路各单位的一些豫剧爱好者组织起来,先后上演过《打龙袍》、《桃花庵》、《打渔杀家》、《苏三起解》、《日月图》等大戏或折子戏。别看演员大都来自一线,唱念做打却没啥挑剔,深受职工的喜爱。逢年过节,在紧靠图书室的大开间平房里还举办舞会,城区的交谊舞爱好者都赶来参加。而薛长山、刘光远、李全东、孔宪柱、张秀英、郇惠芬等一批年轻的文艺积极分子,以饱满的热



兖州俱乐部外观

【故地往事】

兖州老铁路俱乐部的过往

□ 张洪志

情,精心排演话剧《雷锋》《千万不要忘记》《青年一代》《苦菜花》等。拉开帷幕,台上演得尽兴,台下掌声不断,剧场气氛是一派轻松快乐。

“文革”中,为配合当时炙热的政治形势,铁路俱乐部经常组建职工宣传队,搞些文艺演出。成员尽管是从各单位临时抽调的,却很齐整,曲艺、演唱、舞蹈、杂技的活儿都能拾得起,拿得出,就是乐器有些简陋,一架手风琴撑起



俱乐部建于1957年5月

乐队的半边天,二胡、板胡、扬琴、竹笛是绝对主力。演出也没有什么招待和补贴,只是遇有晚场,每人才发给一条饼干或两个面包作为夜餐。尽管如此,演员们的热情还是蛮高的,节目大都是自编自导自演,开场通常是“红旗舞”,主要内容还是配合安全生产教育,颂扬运输一线职工的主人翁责任感,像以对口词、小演唱、杂技、快板书、豫剧清唱等形式,表演的《护路房》《送料下车间》《快乐的炊事员》《我是机车乘务员》《夸食堂》等节目,生动活泼,有情有趣,每场演出都吸引众多观众,就连舞台前面的通道上,时常都站满了人。

年复一年,铁路俱乐部于平凡中发展,在发展中传承,成为铁路职工乃至周边居民最熟悉的文化“地儿”。到了上世纪90年代,铁路俱乐部光彩不再,一座全新的多功能俱乐部易地而起。没过多久,老俱乐部的昔日邻居都在城镇改造中被拆除,只有它披挂着50年坚守岁月的风尘,强挺着已经弯曲的脊梁,端坐在一片瓦砾中,静默地看着小城变美、变靓。从坊间听说,因为这是一座房龄超过五十年的典型苏式老建筑,才得以保留下来。如今,从它身旁走过,那刻上悠悠时光的围墙,那穿越时空的悦耳曲调,仍让人感到亲切和温暖。

【行走齐鲁】

一脉相承的两座兰陵书院

□ 郑学富

据《峰县志》记载,台儿庄兰陵书院是在乾隆四十八年(1783年)修建的。但是追溯其源头,兰陵书院在春秋时就已有之。由于在历史上,无论管理体制如何变化交替,台儿庄与兰陵一直同处于一个县治,所以笔者认为,清朝时的兰陵书院与春秋时的兰陵书院是有渊源的,可以说是一脉相承。

兰陵书院始建于春秋末期,创建者为鲁国高柴。高柴出生于公元前521年,为孔子“七十二贤”之一,孔子认为他憨直忠厚。高柴曾做官于鲁国、卫国;教书于陈国的太康、商水、杞县,鲁国的兰陵以及楚国。高柴在兰陵游学期间,创办了兰陵书院,教授弟子,传播仲尼之道。高柴离开兰陵后,其子高魁继续执掌兰陵书院。兰陵出过不少鸿儒经师、历史名人,无不与兰陵书院的教化有关。

之所以说清朝的兰陵书院与春秋时期的兰陵书院一脉相承,是因为台儿庄与兰陵颇有渊源,古代同属兰陵邑。秦汉时期,台儿庄是兰陵镇的一个小村落。明朝万历之后,京杭大运河避黄改道经过台儿庄,随着漕运的兴起,台儿庄逐渐发达起来。到了康乾盛世,无论是城镇规模,经济发展还是人口,台儿庄都远远超过了兰陵。两地同属峰县,此时的兰陵书院有名无实,知县张玉树将兰陵书院迁建到台儿庄已成自然之事,其目的是借助台儿庄的巨商富贾繁荣发展兰陵书院。

张玉树,在乾隆四十年前后任峰县知县。张玉树学识渊博,胆识过人。据《峰县志》记载:“公(即张玉树)识量尤伟,通晓情伪,铲除奸蠹,胥吏皆敛手不敢为非。”张玉树注重教育文化工作,时常巡视乡村学校私塾,对那些勤奋教书,通晓文章,讲大义识大体者,当面嘉奖鼓励。由于他奖罚严明,全县士儒形成了良好风尚。

张玉树认为台儿庄乃人杰地灵,钟灵毓秀之地,如不在此建立学堂、设坛授教,真是美中不足。张玉树查阅好多史料,访问好多人,都说峰县治下古时有一座书院,名曰“兰陵书院”。张玉树认为此名甚佳,便采纳了文士意见,在乾隆四十八年(公元1783年)划拨资金在台儿庄的东门里建了一处书院,名为“兰陵书院”,并制定了一些规定条文,选派县内十多位著名士绅为董事,管理书院的经费、地基、文契等一切账目,建章立制非常完备。次年立碑并撰写《兰陵书院董事碑记》,其中说“台儿庄新建兰陵书院,为教育人才之地”。

张玉树兴建兰陵书院后,又历经三次修缮,即嘉庆二十年的知县张涛、道光二十年的知县张梦琪、咸丰元年的知县朱彦华分别进行了大规模重修。这之后,兰陵书院具备了相当规模。据《峰县志》载:“中为讲堂三间,东西厢各五间,二门楼一间,大门楼一间。门之内草房六间,以居学役。讲堂之北,复楼其后轩,以为燕息之所。”后来太平天国起义,咸丰八年(1858年)秋,捻军首领张乐行、刘天福探知峰县台儿庄富饶,为筹集军饷,率军数万直取台儿庄,守军弃城而逃。这以后,县府银库再也没有经费拨付书院,好在台儿庄的士绅富贾积极捐款输资,书院得以正常运转,没有废弃。

到了光绪二十八年(1902年),知县王贻哲奉札改兰陵书院为校士馆,是年秋,又禀告申请在兰陵书院设立小学堂。到戊戌变法维新失败,仍然以兰陵书院之名延续二十余年,直到北伐战争后,又以学校、学堂名义保留。

1938年春,台儿庄战役爆发,繁荣富庶的台儿庄变为一片废墟,兰陵书院也未能幸免。抗战胜利后,1946年著名乡绅孙业洪积极筹资,在兰陵书院原址创立私立学校,取名“胜利中学”。不久,国共内战爆发,淮海战役前夕孙业洪携胜利中学学生南迁,后辗转台湾。这批学生大多成为宝岛才俊,如金门警备区司令、中将马云生,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郁化青,著名油画家金哲夫,著名历史学家张玉法等蜚声海峡两岸。

新中国建立后,台儿庄地区成立兰陵县,县政府驻地设在台儿庄。1952年10月,临沂专署在“泰山庙”旧址创立“山东兰陵中学”。1953年迁至兰陵书院旧址,后几经更名,就是现在的枣庄二中。

【老照片】

难忘新兵连

□ 尤怡莎

“十八岁十八岁,我参军到部队,红红的领章映着我花开的年岁,虽然没戴上呀大学校徽,我为我的选择高呼万岁”。每当我听到这首歌,就会想起自己当兵那段历史,心里充满了激动和自豪。

1977年1月,我从家乡济南到淄博当兵,从学校踏入军营,从懵懂的学生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。因为是城市兵,为此部队领导用更高的标准要求我们,让我们吃了不少苦头。新兵连有两个排8个班,百十号人,进军营首先是走队列,稍息、立正、向左向右转、齐步跑步踢正步,一天训练下来,我们筋疲力尽浑身像散了架一般。辛苦点不算什么,最害怕的是晚上紧急集合。我们班加老兵班长10个人,睡一张大通铺,有时刚躺下,有时在睡梦里,“嘟——嘟”,紧急集合的哨子一响,我们赶快起床,摸黑穿衣服打背包连走带跑赶往操场集合,拿错衣服穿错鞋是常有的事。开始我们以为晚上就一次,没想到有时两三次,搞得我们措手不及。不仅如此,还要进行野外急行军,途中加上空袭演练,背包散开,摔跤、掉帽子、掉鞋子……我们出尽了洋相。

周末也不轻松,班长会安排我们到炊事班帮厨做饭;还要学习军容风纪,被子要求叠得像豆腐块,我和好几个女兵还把心爱的长辫子剪了……总之,在连队一切行动都要服从命令听指挥,吃饭、看电影要排队,外出3个人以上也要排队。连长常说:“当兵就意味着责任、奉献,平时多流汗,战时才能少流血。”我们在摸爬滚打中磨炼了意志,强健了身体,学会了勇敢和坚强。经过新兵连三个多月紧张而严格的训练,我们终于戴上梦寐以求的帽徽领章,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。1978年1月,我与战友在淄博张店公园合影留念(中间为作者)。

18年的军旅生涯,我把青春献给了部队。忆往昔,38年前的往事历历在目,生命里有了当兵的历史,一辈子都不会忘记。

